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制度治党的探索

□ 张太原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毛泽东郑重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讲的是作风，提出的却是制度问题：一个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党，靠什么约束自己，以免重蹈覆辙。

党的领导走向制度化

1949年至1956年间，我们党进行了一场以制度和规矩管党治党的持续探索，勾勒出以制度求长治、以规矩成方圆的最初轮廓。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已经形成一套组织制度，如党委制、支部制、民主集中制、纪律检查等。1948年9月，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针对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规定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把民主集中制从原则落实为可操作的决策程序，正是制度治党最可靠的一环。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系统内普遍设立党委会和党组，保障党的意志和各项政策在国家机构中贯彻执行，这是党的领导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党如何“进”到国家机关里去，又不“包”办其事务？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寸说得极为形象：“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就把“领导”与“包办”在制度上分开了：党决定大政方针，但不替代行政机关的具体职能；党的领导通过组织、通过程序、通过监督来实现。

与此同时，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也转入制度化的轨道。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划出了规范：党员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这正是依规治党的又一层要义：标准即规矩。“工人阶级先锋队”若是抽象口号，便无从检验；化为可以对照、可以审查的条件，抽象的称号才成为刚性的门槛。执政党的门槛只能比革命

年代更高，这正点出了执政条件下的总方向。这次整党经过学习、登记、审查、处理诸环节，又与“三反”运动相结合，至1954年春基本结束，党的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明显改善。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确定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的部分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党管干部”的原则自此有了层级分明、职责清楚的制度形态。如果说党委制、党组解决的是党如何领导，整党和组织建设解决的则是党如何管好自己，制度治党由此有了组织载体。

纪律检查与监察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多月，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这表明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执政党的第一重风险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1950年5月6日，中央直属系统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召开，朱德在会上作《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指出：党执政之后威望日隆，少数党员的不良言行即足以破坏党的战斗力，“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讲话直陈当时党内违纪的突出表现：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滋长，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特别突出，贪污腐化比过去增多。究其根源，既有革命胜利带来的麻痹与骄傲，更有旧社会恶劣思想作风的侵袭，这些根深蒂固的坏东西“还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不断地影响、侵袭和腐蚀我们”。诊断既明，药方随开：以思想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朱德还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最见依规治党的要义：“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这里“只有一种纪律”，正是针对执政条件下最易滋生的“特殊党员”心态。

与党内纪律检查同步的，是行政系统的监察。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人民监察机关，监督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检举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监察部，以代替原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关于处分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草案）》对纪律处分的程序、批准权限、取消处分等作出具体规定；中央纪委制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若干规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就纪律处分的执行作出较系统的专门规定。从此，对党员和干部的处分，有了固定程序、固定权限、固定依据。

制度的生命在执行，规矩的威信在动真。1949年至1956年间，我们党面临的考验是多维度的：既要惩处贪腐以立威，又要约束权力以防分裂。前者以刘青山、张子善案为标志，后者以高岗、饶漱石事件为标志，两案相隔不过三年，却共同推动了制度治党的起步。刘、张案的制度意义在于催生法制反腐的确立。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明确规定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二人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各项职务。邓小平在会上代表中央作报告指出：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负责任的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并强调，必须“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体制因问题而升格，这正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与时俱进。

党的八大的制度贡献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7年来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制度性总结。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围绕“执政党的地位，向党提出了怎样的新考验”这一问题，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危险因执政而增，不因胜利而减，这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忧思一脉相承，也是我们党

执政7年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得出的科学论断。报告强调：“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把制度摆到思想教育之上，这在党的文献中极为醒目。

八大党章把这一思路落到实处。其一，“群众路线”的概念首次写入党章总纲，把党与群众的关系定格为执政党的根本规矩。其二，重申民主集中制，突出集体领导。党章总纲明确规定：“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在解释党章时指出，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并尖锐批评“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认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其三，把监察委员会体制正式写入章程：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其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至此，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框架初步成型。

党的八大的另一项创设，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它产生的委员会行使职权，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若干年才开一次的会议，变成常设的最高权力机关。然而，由于此后国际国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八大确立的制度没能刚性执行。

制度立起来、规矩立起来，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规治党，首先是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从“立起来”到“严起来”，再到“执行起来”，三步之间隔着一段不能省的距离：制度写在纸上，规矩立在心里，都得靠一字一句的执行，才成为现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规矩的生命力在于成为习惯。说到底，制度立起来、规矩立起来是同一件事，让党的意志不靠少数人的自觉，而靠制度与规矩，落到每一个岗位上、每一个人的行动里。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后那7年留下的启示，也是今天必须继续做好的功课。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付子震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当时艰苦的条件和严峻的战争环境，遵义会议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很有限，其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两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两件珍贵档案均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危急关头的历史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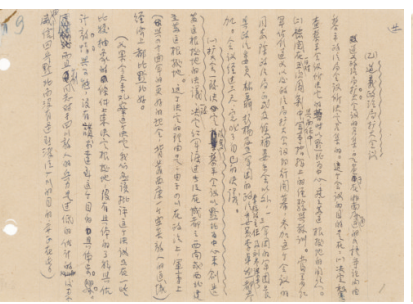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决战，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大部分壮烈牺牲，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和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中，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

关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渡过湘江后党中央内部一直存在分歧。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是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是避开国民党军布下的埋伏，中央领导人曾发生过激烈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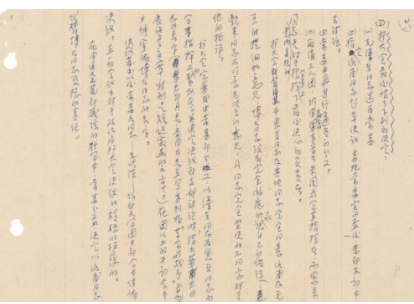
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红军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着，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为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力挽狂澜的真理辨析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刘伯承、李富春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中记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节录）（中央档案馆 藏）



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随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and 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等就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许多意见。正如《传达提纲》所指出，“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

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当时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历史雄辩地证明，革命理想、革命信念能够迸发出克顽敌、撼山岳的无穷力量，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深刻总结红军长征历史经验作出的重要论断。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奋勇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的光芒。理想信念是我们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各种困难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漫漫征途上，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心怀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完成了一次“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

理想信念是红军长征英雄气概、坚定意志和革命力量之源。红军是党坚强领导、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英勇革命队伍，党指向哪里，红军就冲向哪里。在长征中，红军面临着约百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面临着高山大河、险关要隘，面临着高寒缺氧又缺粮的极限挑战。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坚信只要跟着党走，革命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在湘江血战中，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担架上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22名突击

克顽敌撼山岳的无穷力量

□ 王新生

队员爬上铁索冒着枪林弹雨向对岸冲去，与后续部队一起占领了泸定桥；在攻打天险腊子口战斗中，红军攀上万丈悬崖，摸到敌人侧后，协同正面进攻的部队一起猛攻，占领腊子口，奏响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因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以辛勤的汗水去践行崇高理想信念，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在遵义战役中，红军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之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南，再袭云南，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遵义会议后更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浴火重生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

